

国企改革：坚持在深水区奋勇前进

——专访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金思宇

■ 本报记者 王敏

近日,中央任命了新的国资委主要领导,此举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人们都在猜测或观望国资委新任掌门人将有何新的举措?如何在完善国资监管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正值国资委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国资专家、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金思宇。

在完善国资监管中 深化国企改革

《中国企业报》:金教授,作为知名国资专家,您是否用几句话评价一下十年来的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工作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思宇:自2003年3月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毫无疑问,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有资产监管框架结构和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资产总量和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但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完成,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市场活力仍需进一步增强;国有资本流动机制仍不顺畅,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任务仍然艰巨,国有资产监管远没有完全到位,监管体制、体系和格局尚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企业报》:您对中央新任命的国资委两位主要领导如何评价?有何期待?

金思宇:近日,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同志在国务院国资委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了中石油原董事长、党组书记蒋洁敏同志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张毅同志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的决定。我们认为,两位主要领导一个来自央企,一个来自地方,各有不同的经历、背景和优势,都有西部省区主政经历,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均为十八届中央委员,“空降”到国务院国资委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新一任领导赴任正好赶上国资委成立十周年。相对于李荣融时代“建章立制、做大做强”谋发展和王勇时代“央地合作、做强做优”练内功而言,新任国资委掌门人既面临历史机遇,也面临风险挑战,在前两任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既要为国企改革搞好顶层设计,明确新的路线图,又要探索国企垄断行业企业改革市场化、公众化的突破口,还要继续在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中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新动力。可以预见,“敏毅配”将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开启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拓市场的新时代,形成国资监管“责任明确、权力制衡”上水平的新格局。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改革任务,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再次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明确提出“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如今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and 攻坚阶段,因此,深化国企改革不仅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信念和搞好国有企业的决心,而且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触及利益集团敢于碰硬的魄力和锐意创新的动力。

具体来看,蒋洁敏在石油战线干了几十年,既有地方从政经历,又有央企管理经验,既懂得政府机构运行规则,又对市场具有高度的敏锐度,从央企龙头“老大”到国资监管“掌门人”,由被监管者到监管者的角色转变,他的思路和做法肯定会与刚刚升任国务委员的王勇有所不同,可能会侧重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企



金思宇

“

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要破除利益集团的藩篱和掣肘,使之分类归位,责任主体明确,并放在法制的“笼子”里由出资人代表加以集中监管。

——金思宇

市场化水平,解决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扭曲环节,强化国资监管的制度建设和舆论环境。张毅在地方和中央从事党务工作几十年,熟悉纪检监察和党建工作,是一位资深的省部级领导,他可能会侧重于干部队伍建设和企业党建、纪检监察工作,强化廉洁从业,加大查处力度。可以说,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国资监管机构都对新任领导寄予厚望,无论学术界还是各类媒体都是热切关注。

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思宇: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企改革都是最复杂最敏感最难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一个不断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互动的过程。应该说这些年来,各地政府和各级监管机构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尤其是政企分开,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远远没有到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倒退现象。政企分开也是如此。关键要破除利益集团的藩篱和掣肘,使之分类归位,责任主体明确,并放在法制的“笼子”里由出资人代表加以集中监管。

严格地讲,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有些领导干部还在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有时直接干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很多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需要的行政审批项目还有所保留。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个关系不顺,不仅妨碍公平竞争,影响市场正常运行的效率,还会滋生腐败和“寻租”现象。

市场经济是自由交易经济,但市场交易有效有序进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法治。法治可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等。倘若没有法制的保障,产权就是不安全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致力于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利益,就不可能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就难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重要的是建立有竞争的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公平竞争的话,这个市场的效率一定会降低的。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理念,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换言之,要用法律来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的行为,保障市场经济高效运行、健康发展。所以,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企业报》:那么您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金思宇: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表明,政府拥有“三只手”:一只是为无为之手,一只为扶持之手,一只为掠夺之手。掠夺之手的意思是政府的权力太大了,没有约束。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当发挥政府无为之手、扶持之手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限制政府掠夺之手。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目前,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特别要更加尊重企业主体,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发展规律,更好地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能够公平地竞争,能够自我调节,优胜劣汰。

改革没有完成时 坚持“两条腿走路”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国民共进”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社会上还是不断抱怨“国进民退”,您认为原因何在?应该如何实现“国有”和“民营”合作共赢?

金思宇:事实上,从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产值利润等统计数据来看,“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之所以会有“国进民退”的争议和抱怨,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一个不完全公平的境地,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要做的就是研究落实如何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强化法制力量,从权力主导型改革转向依法推进改革。政府要管好该管的,至于不该管的则应由市场去引导去调节。

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决不能偏废。不搞单一

的公有制,也不搞全盘私有化。“两条腿走路”是中国经济成功之道,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公众化、法治化。另一方面,要支持和帮助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实行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经营多样化、资本混合化,使之成为国有企业重要的生产加工、补给基地和劳务协作力量,实现“国有”、“民营”合作共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否也适用?有何高见?

金思宇: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现阶段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许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扩大规模、增加投入等外延性扩张模式,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自主创新投入和能力不够。产业规划或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电力、铁路、烟草等仍处于垄断地位。一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仍然需要靠政府的优惠政策扶持,结果盲目上项目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即使出现巨额亏损了由政府来买单、核销或注资。有些企业片面地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而反对改革,有些企业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技术骨干青黄不接、庞大的臃员难以辞退,导致企业包袱越来越沉重,等等。我们认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对深化国有企业同样适用,是完全可以好用的“大利包”,也是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强大动力。

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由探索型转向目标型改革,集中民智搞好顶层设计,注重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操作性。具体地讲,一是继续加大国有经济的布局 and 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企业重组整合,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促进中央企业的资源向重要行业的优势企业集中。二是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主业投资制度,严格控制新增非主业投资,推进主辅分离,引导企业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三是加大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力度,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淘汰落后设备,发展循环经济。四是通过压缩管理链条,加大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力度,优化业务结构和组织结构,推进产业布局向产业链高端发展。通过风险投资等新的投融资模式,吸引、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投资,支持合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五是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考核政策和中长期激励制度,加强自主创新和知名品牌建设。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大力实施“千人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六是主动寻找新的资源带和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让更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锤炼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理性对待舆情 提升国企形象

——专访中国经济安全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

■ 本报记者 蒋皓

关于“妖魔化” 警惕“妖魔化”言论背后的制造者

《中国企业报》:中国的大企业被指责的不在少数,尤其是针对大国企“妖魔化”言论曾沸沸扬扬,这个苗头不制止是十分危险的。您觉得出现类似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江涌: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大企业成长势头非常好,非常令国外资本“羡慕、嫉妒、憎恨”,这些大企业以央企、国企为主,民企占一部分。我说过市场化下的舆论总是被资本操纵的,而西方国家资本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往往一体化了。中国有一部分资本是跟私有资本、国际资本相区别的,这就是国有资本,它们是私有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的天敌。在后者于国际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势下,奉行“非我族类,其行必异”,内含“阶级仇、民族恨”,所以攻击、丑化国有资本,散布“妖魔化”舆论。我们要深究,一些热衷“妖魔化”国企的媒体,谁是它们背后的操纵者呢?

一些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暴力方式,来维护与实现西方利益,诸多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它们所掌控的媒体进行妖魔化宣传,这就要警惕。

妖魔化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是让国有企业让出资源,腾挪空间,满足私人资本与跨国资本的扩张。国企跟跨国公司争利,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这些大央企、国企跟这些资本直接构成市场竞争,成为它们在中国扩张的巨大障碍,所以清除障碍、干掉国企以谋取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权是它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企业报》: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是,还原国企的真面目、本来面目,不美容也不毁容。但咱们国内公众也跟着拍巴掌叫好,这种“困”况,如何解释呢?

江涌:国企过去与今天也一直存在不尽如人意的缺陷,过去是国家化、社会化太多,今天则是市场化、铜臭化太过,从而成为指责与攻击的把柄,一些舆论就是利用了老百姓的心理,煽动这样一种“仇恨”。

一些国有企业在为国家经济服务的同时应增强社会化,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大众服务。特别是一些资源等自然垄断型国企,要以服务为导向。当然,很多问题不光在企业层面,也在政府层面,毕竟国企改革是由政府设计与推动的。对国企改革不能搞一刀切,哪些是充分竞争领域的,哪些是资源垄断型的,哪些应更多面向市场调节,哪些则更好地适应于计划指导。总之,要取之于市场,用之于民。

国企职工的责任感、荣誉感流失严重,一些管理者敷衍塞责,导致对市场化媒体一些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听之任之,因此在强调国企的社会责任、国家责任的同时,应当提醒国企职工与管理者,拿起法律武器,承担维护企业声誉、荣誉的责任。

关于央企形象公关 “做比不做好,早做比晚做好”

《中国企业报》:我们看到一些央企在做努力,为了挽回光辉形象频频做着努力。您如何看待央企的这种改变?

江涌:做比不做好。在一波接一波的声讨中,有两个现象反差极大:一是某些具有极大极深外资背景的媒体始终一马当先,利用其拥有的平面、视听、网络媒体全方位大肆炒作妖魔化国企,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监管的互联网上叫嚣得很厉害;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似乎有意接受咒骂与讨伐。

“网络水军”的肆意炒作“天价酒单”等羞辱央企颜面的挥霍浪费事件,被不断扩大,甚至扭曲,导致大众对央企的印象差到难以容忍的地步。

对于央企来说,如何打造正面舆情、矫正大众负面印象、“去妖魔化”已到了不容耽搁的地步了。所以我认为,做比不做好,早做比晚做好。

恨也要、爱也要,作为共和国长子,他的成长烦恼、他的功过是非关乎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实际上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大家要有“平常心、爱心”,指出他们缺陷,帮助他们进步,决不可跟着市场化媒体一起妖魔化国企,然后干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私有化,被私人资本国际资本所瓜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我们要引导舆论去客观、正确地看待国企。

大企业承载“中国梦”

《中国企业报》:那么,在你心目中,大企业的正面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江涌:中国的大企业应该有个整体的行业形象、企业形象。习近平总书记说了“为人民服务”,咱们国有企业为人民服务,为国民谋利益的旗帜要举得高高的,要理直气壮地把这个旗帜举起来,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

“中国梦”需要国企在经济领域扛旗,要肩负更多的责任。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六种职能形象必须建设好——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参与者、干净财富的创造者。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对这六种职能形象的捍卫,中国经济主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才能保障;“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稳如磐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焕发新的光彩;企业的社会责任才不会“空载”与“超载”,而是“适载”;国民经济调控才能卓有成效;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相比,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将远离血与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创造经济效益的手段光明,道德高尚,财富干净。